

集云烟雨见朱颜

——《集云道上》述评

■金庆伟

岁末之际，《集云道上》第二辑出版，这是集云书社历六年之汗水集腋成裘的作品集。收录在书中的110幅作品，既有书社老师陈养绿的汉简、章草、行草书等40幅作品，也有学员临摹和创作的70幅作品。

书法作为中国艺术中极具表现力的一种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代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陈养绿的书法既能见到颜真卿、张旭、怀素、黄庭坚的雄浑大气、游若惊龙，也有钟繇的古雅质朴，米芾的沉着痛快、飘逸超迈，二王的道美健秀、含蓄中和。陈养绿创作的草书作品永嘉大师《证道歌》，能看到类似颜真卿在《祭侄文稿》中的情感宣泄，笔法急促而厚重，笔画之间的连接不再仅仅是形式上的连贯，而是带着一种情绪的推动。“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以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诗句形容陈养绿的这篇《证道歌》草书作品同样适合，既见自由奔放，又在舒放里见其严谨，这种严谨和稳定与呈现在《证道歌》里如飞云江水绵绵不绝的灵动性相互映衬，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

张旭、怀素的草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风格流畅、连绵不绝，在字与字的连接上更是达到了一种自然流畅的境界。陈养绿的草书长卷在追求线条的质感上借鉴了怀素、张旭的草书，试图通过中锋用笔来表现线条的圆润和弹性，线条犹如丝线般柔韧，笔画的起笔、行笔和收笔都有明显的中锋痕迹，这使得线条在视觉上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种风格在其《南怀瑾诗二首》《录怀素藏真帖》《胡珩君子石》等草书作品亦有不同程度展现。而收录其中的《洗研烹茶联》和《香雪仙辞联》等作品，笔画的伸展幅度很大，线条具有很强的张力，如同长枪大戟。颜真卿、黄庭坚的行草常采用错位、夸张的手法，使字的重心偏移，从而营造出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欣赏陈养绿的草书，我常会想起陆游《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中所述“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陈养绿的作品丰富充盈，遑论行草、大草，即便章草、汉简、篆隶等作品，也是可以见到多种传统影响的融合，比如情感表达上借鉴颜真卿，在线条质感上取自张旭、怀素，在结构创新上又受到黄庭坚、米芾、二王的启发。这种融合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轼认为学书的核心在于崇尚意趣，“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甚至还在诗里打趣，形容书法之妙乃“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书艺之路，嬉戏于心。陈养绿不只



是在自我学书之路上不断超越，这些年来，他潜心教学，奖掖后学，两期研修班历时六年，也结出丰硕成果。集云书社研修班的同学结社学书，在书山羁旅了多年，不能说满山红遍，却也是落叶知秋，红柿挂枝。恰如陆游《雨中读书》所言“一灯如萤雨潺潺，老夫读书蓬户间。但与古人对生面，那恨镜里凋朱颜”。比如高启铨、林智武、林日展、王横、叶海鹤、金建光、吴时敢、蔡瑞乙、胡奕丹、周小丹等人在结构布局上深得陈养绿老师课堂上的理论精髓，在这次作品集子中均有着不同形式的表达。吴时敢的《李白诗一首》颇有几分王铎神韵，笔法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情感表达。王铎的线条常常是扭曲、缠绕的，如同江南山林间纠结的藤蔓。在书写这幅作品时，吴时敢较好地把握了王铎的笔法，用笔的速度和力度变化极大，有时一笔下去如疾风骤雨，有时又缓缓行笔，若有所思。这种笔法风格与书写状态契合了王铎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状态。林日展的《赵孟頫题跋八则》作品矫若惊龙，收放自如，对线条的把控已相当不错，较好地代表了他这些年学书的长进。高启铨的《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帖》那种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风格，就像是江南山水间自由生长的草木，不受拘束。陈朝晖《王维诗二首》的书法风格淡雅空灵，笔法细腻，线条流畅而富有弹性，这种风格与其多年浸润于董其昌行草有关，阴柔中不乏含蓄性，而习书王铎，笔锋外露雄浑劲健的书风恰好为他的柔性予以了补偿。

“碰”瓷记

■张秀玲

闺蜜好喝茶，注重喝茶仪式，茶具自然也不马虎。喝茶的杯子颇为玲珑雅致，长相又各不相同。每次她饶有兴趣告知杯子名称，我随意哦了一声，但压根没记住。

在教学《景泰蓝的制作》时，在欣赏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时，那个瓷器，那个瓷之源的浮梁，像安放在橱窗中的展品，跟我隔了一层玻璃，更遑论在我心中掀起一丝波澜。

前段时间，一位审美品位较高的朋友，去景德镇闲逛了几天，回来盛赞不绝。那时我恰有几天小假期，正寻思去哪里休闲。她的话恰逢其时掠过耳际，计上心来。或许人生中某些重要的东西都是欲擒故纵的，在等着对的时间相遇。之前一次次喝茶，朋友的旅游体会，那篇课文，那句诗，层层叠加，似乎就是为我出游景德镇蓄势。

三天时间，不管是博物馆，还是陶溪川、三宝村等文化街区，陶瓷就像圆心，始终让我们围绕它旋转。做攻略时，我就这样认定，博物馆是课堂是教材，而各类瓷器文创园就是实践基地。所以一着地，就迫不及待奔赴中国陶瓷博物馆。

对于门外汉来说，博物馆那些瓷器，尽管按照朝代顺序展览，也有介绍，但那各种各样的名称眼花缭乱，佶屈聱牙。于是我先拍照，回来再查询相关资料。同伴戏谑我，你自带上课风格呀，还事先备课，课后反思巩固呢。诚然，有了这个环节，第二天参观御窑博物馆时，对瓷器的沉浸式阅读便顺畅起来。

看瓷器，要看口、颈、肩、腹、底部。

瓶口，分撇口敛口侈口直口。纹饰，有龙凤麒麟和缠枝花卉。单就瓶子类型，分梅瓶、玉壶春瓶、蒜头瓶、柳叶瓶、贯耳瓶之类，而青花、颜色釉、粉彩，则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中的三朵金花。古代瓷器的全称里要依次体现出现年代、品种或窑口、纹饰、器型，譬如看到明永乐甜白釉刻花缠枝莲纹梅瓶这冗长名称时，我就能驾轻就熟地分解其各个要素。

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青花瓷，本略有所知，素雅高洁温润，是陶瓷中永不凋落的青花，也一直为古今文人所吟诵。粉润柔和的粉彩，过于富丽堂皇。面对颜色釉，绿如春水，雨过天青，润如海棠，植翠千峰，色彩的细密丰富繁复，瞬间让我沦陷其中，只觉得世上所有语言也无法确切地描写其色彩。

单就红色，它的分支如人身上毛细血管那么精细又庞大。郎红、霁(祭)红、宝石红、朱红、大红、胭脂红、粉红、豇豆红、矾红等等，单看文字，已觉满目璀璨，扑人眉宇。而霁红牵住了我的眼光，那是怎样的颜色，霁是雨后初晴，该是雨后霞光吧。确有乾隆《咏宣德霁红瓶》为证，“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但为何又把“霁”写成“祭”红，隐隐约约感到这背后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御窑果然，传说明朝某位皇帝，下旨要御器厂烧造一批鲜红色的瓷器。殊不知，景德镇传统制瓷工序繁密而精细，“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而红色釉最难烧，对窑内温度和气氛要求极高。器物屡烧不成，窑工自然难逃一劫，危难之际，受高人指点，一位老窑工的女儿纵身投入燃烧的窑火中，化

阮瑞雪的字结构端庄，但是又有一种灵动之美。这与她少年学书功底有关，她的书法追求一种禅意，如同江南山水在晨雾中的朦胧之美。林智武《陶弘景文》中锋起笔，起笔较为厚重，迅速调整笔锋，顺势行笔，就像温瑞塘河上翩跹灵动的大脚鹭鸶，起始处的锐利如同尖喙。曾定煜的《临米芾手札四则》虽是临作，却也见其笔力，如冬雪中的腊梅遒劲刚挺，既有他多年浸淫于甲骨文而习得的金石味，也取二王、王铎、米芾等人之势和意，写出了深秋中飞云江边芦苇俯仰、鸥鹭翔舞的萧瑟苍茫。叶海鹤的《临米芾尺牍》、胡奕丹《李白诗一首》善于运用中锋和侧锋的转换。中锋行笔时，线条圆润、厚实，富有立体感。侧锋行笔则能制造出线条的粗细变化和凌厉的感觉。你很难在其俩作品中读到女性书家的婉约，更多的是听到了金戈铁马，战马嘶鸣。陈瑞洁有很不错的篆隶底子，她的作品里有着王铎的筋条和气韵，而蔡瑞乙几十年的警官生涯，赋予了他刚健，读他的《杜甫春夜喜雨》，不期然想到杜甫的《登高》，有时行笔如疾风骤雨，有时行笔速度又很慢，笔画凝重，仿佛是江南山水中沉稳的巨石，正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冬至刚过，门前的残荷在山野的浓霜中逐渐变枯，变干，随手一拍，无不是最好的线条与意趣。这个冬天，已近腊月，这本册子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暖意和诗意。

为一团光焰。只见整窑瓷器晶莹剔透，红光如雾，从此这釉色便被称为“霁红”，因是少女以身窑瓷而成，又叫“祭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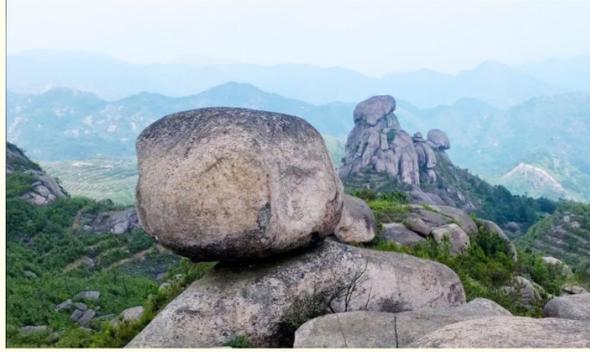
而豇豆红算是为数不多的传奇者。因红釉难烧，经常会有失误，豇豆红原本是次品，却惊动了世人，皇帝见了也喜欢，便下令窑厂专门烧造，成了失败之作里的成功之作。这些传说，连同悲壮的瓷神董宾故事，说明每一件精美瓷器都来之不易。

每个展品，有历史就有聚焦。青花瓷中的蟋蟀罐本没有惊艳之处，但我驻足良久，因为蒲松龄的《促织》。小说开门见山：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背景得到印证，宣德帝朱瞻基以其文治武功著称，但他有个癖好，喜欢斗蟋蟀。异史氏曰“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小说本是鞭挞封建社会黑暗，主人公命运竟然和一只蟋蟀休戚相关，委实荒诞。不承想，历史也开了一个玩笑，蟋蟀罐的命运也如文中主人公，当宣德帝突然驾崩后，太后便命令摧毁宫中所有蟋蟀罐，而窑厂的蟋蟀罐也难逃一劫。蟋蟀罐在这里出土最多，但在两岸故宫博物院难觅其踪的谜底由此揭开。

买几样日常瓷器，是这趟旅游目的之一。多看了几眼博物馆那些精品，再去市场，在挑选时，我能跟店家说上一两句行话。千挑万选，最后锁定了一盏祭红主人杯。祭红难烧，但付出代价终有惊人结果；即使没有朝着既定方向，但剑走偏锋，有了豇豆红。人也如此，难免有风风雨雨，但沧海月明珠有泪，终能蚌病成珠。故事就是杯子的肌理，端着这样杯子，茶逢知己，可敌它晚来风急。

陶山旧闻再忆

■宋维远



陶山，在瑞安、温州乃至全国都算得上“名见经传”的名山，因为南朝齐、梁间陶弘景曾在这里寓居过，后人以人名山，又以山名地（历代陶山曾用她冠名区、乡、镇的行政机构驻地）。这些事也早已成为瑞安人世代相传的常识，毋庸庸者再赘述了。但笔者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除陆续获知一些有关陶山的历史人文资料外，还曾听父老们津津乐道与她有关的红色故事、民间传闻，垂暮之年与朋友谈起，似觉鲜活。于是在友人的怂恿下，简录部分于后，供同龄的陶山人作回忆的线索，也与青年人分享。

陶山，在《辞源》中与八万多词条同列

《辞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汉语大型工具书，1915年至1931年相继出版正编和续编。到1958年出齐4册，全书共收汉字12890个，复词84132条，地名一般只收县及县以上政区名称。但瑞安县除瑞安人入选为词条外，还有陶山也以山名与五岳一起跻身《辞源》词条之中，实属幸运。全中国名山数以万计，而陶山只是一座低山小丘，既无奇峰异洞，又无圣泉险瀑，在当今温州市域中除雁荡山作为国家级风景区入选外，其他如原属瑞安的仙岩及泰顺、文成的多个山峰都未被列入。

《辞源·陶山》作如下表述：“山名，在浙江瑞安西。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居此，因名。道书以此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参阅《云笈七签·二七洞天福地》《读史方舆纪要·九四温州瑞安县》。”也就是说，陶山是因陶弘景这位曾主张儒、释、道合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作出贡献的名人纪念性地而被遴选列入《辞源》，成为该书84132条复词词条之一。因此，陶山人、瑞安人除感到荣幸之余，又会觉得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陶山，曾召开过万人示威大会

这个大会的全称是：浙南反军阀战争示威大会。

历史背景是：1929年3月，蒋介石从两年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取缔革命组织后，又与桂系军阀李宗仁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全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扩充军备，在各地强拉民夫当兵，发行公债，增加赋税，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同年，浙南遭到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温州至少有70%的户口没有米粮，30多万人处于待毙的境地。农村阶级矛盾更趋激化，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浙南地区先后爆发多起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1930年7月16日，中共浙南特委在永嘉、瑞安交界的陶山寺山背，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阀战争示威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主席台上高悬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上散发宣传《土地法》《苏维埃政纲》《反军阀战争宣言》等传单，并宣布成立浙南革命委员会。中共浙南特委，永嘉、瑞安县委，游击队，赤卫队、妇女协会，农会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演讲。群情激昂，红旗如海，为浙南空前未有之盛举。

为保卫大会安全召开，瑞安陶山桐浦乡桐岭人、中共浙南特委委员、红军游击队副队长杨德芝等率部在桐岭等隘口，阻击从温州前来镇压的浙保四团。陶山及附近地方的数百妇女除担负维持大会秩序、安全的任务外，还担负大会用餐等会务工作（据《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瑞安市志》《瑞安市志（1997—2012）》等资料摘录）。

这次大会影响深远，笔者在近30年后的1958年在陶山还听到父老们饶有趣味地讲述当年万人大会的一些细节，并笔录当地一首民谣：“当红军，闹共产（原歌词是‘共产党人共产’，觉得欠妥，后改），火轮船用铜包。碰见‘清乡’就开火，一百粒子弹打死九十三。”歌中的“火轮船用铜包”句，指当时红军游击队用小汽轮在金潮港下游江中阻击国民党军警。“清乡”，即指国民党搜捕革命人士的反动武装清乡队。万人大会载入共产党光荣史册，是陶山红色故事中閃耀光辉的一页。

陶山甘蔗和陶山板锄

陶山甘蔗很早就以其松、脆、甜等特色享誉遐迩。笔者儿时常见家乡附近的路亭中甘蔗小贩们向路人推广一种促销游戏叫“甘蔗刮刀”，先是卖主对每株甘蔗讲好价格，比习

惯的“蔗段”价格要低一半左右，条件是让买主一只手用刀在蔗顶扶住甘蔗直立，然后用力将刀从蔗顶中间劈下去（像劈柴片），随着甘蔗向一边偏斜，刀也会向一边偏出，从顶端切口到下面偏出的切口之间，这一段才是买主所得部分，如刀劈空，那么买主一无所得，如刀直劈至蔗臀，便可得整株甘蔗。买主割蔗时，旁观者为之喝彩。试用这种游戏的甘蔗，必须是陶山甘蔗，因为蔗质松，过节部分遇刀即松开，如其他地方产的甘蔗，刀遇过节部分就被阻挡劈不下去。这个游戏便成了陶山甘蔗销售的“专利”。

那么，陶山的甘蔗与板锄，又有什么联系呢？记得1958年笔者到了陶山参加劳动，才发现这里的锄头（俗称板锄）比塘下、莘塍一带涂田里用的锄头及山区开垦的锄头要薄，锄板面积要大而且轻，特别是板锄的柄，不是硬木棍，而是圆竹棒，用起来省力得多。因为陶山的泥土沙粒成分多，较松、软。这或许是陶山甘蔗质松、脆，水分多，连刚从嘴里吐出的蔗渣还会“弹跳”的原因吧！

陶山半街亭

笔者1958年初到陶山时，看见街道中段有座普通的路亭，但对亭口的小匾额上三个字：“半街亭”，觉得十分新奇，并引起许多猜想：一是直观地告诉参观者：这是一座建造在陶山街半段的亭子，自觉这个猜想未免过于表面浅显；二是说明此街道尚达不到标准，仅完成一半，希望后人赓续未竟的部分，后又说自己否定了，因为笔者从未听过国家或民间习惯上有对街道的规模标准的规定，便没有区分“整街”或“半街”的名称，只有旧街、新街、长街、短街之别；三是陶山人对家乡此亭的谦称，说客气话，如古人称自己的家谓“寒舍”“蓬门卑户”等一样。孰是孰非，笔者至今仍未有正确答案。日前想到此亭名，便写信给陶山的朋友，托他代为打听。回答是：此亭因陶山新街建设，已经拆除，尚未重建。于是，又产生遐想：如今的陶山街已非昔比，是否在原街建亭是城镇规划的大事，但“半街亭”这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好名字，被湮没遗忘，实属可惜，如果能选一适当的位置，予以重建，仍名“半街亭”，配上一些明指、暗喻陶山古迹新貌的楹书、楹联，不失为旅游、接待客人休憩的好所在。例如笔者小学时读过写无锡五里香腴的“惠山街，五里长；踏花归，鞋底香”之类的民谣，韵味之浓，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念想。

“陶山普通话”与“陶山捉逃兵”

“陶山普通话”，初听起来像是句贬义词，似乎批评陶山人说的普通话夹杂着当地方言，达不到标准。其实是理解错了，陶山人说普通话并不比其他地方差。便究其源头，原来这句话竟是从“陶山捉逃兵”中来的。

“陶山捉逃兵”的故事，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温州、瑞安城曾数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地区退守陶山、三溪一线。解放战争时期，陶山又是国民党部队“剿共”（即袭击以湖岭为中心的中共浙南特委机关驻地的游击区）驻军的前哨。当时陶山区公所驻地也在陶山，该区还同时管辖今湖岭片区。也就是说，陶山向西前进不过四五公里便是湖岭一带中共军民游击区了，国民党部队的逃兵常常从陶山附近一带山村的国民党军队里逃跑出来，经过这里。国民党瑞安县长及驻军长官都会到陶山区公所坐镇，督促当地乡保长们带乡丁（乡公所里的警察）在树林或路口捉逃兵。这些捉逃兵的人即使在路口捉住了逃兵，也会因被花钱买通而私下放跑逃兵，回头又要编些谎言，来欺骗搪塞县长等人的追责。县长等人大部分是外路人，乡保长们只好用半是普通话、半是本地话与上司进行语言沟通，这些谎话说多了，传出去，被人编成了快板，成了百姓嘲讽的笑料，到处流传。笔者现在还记得一部分：“县长报告，陶山捉逃兵，也捉捉不牢！”稍加分析，其内容确是游击区群众及逃兵者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军警强拉壮丁的写照。那么，后来有人自谦说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借用“陶山普通话”这个故事而已。故笔者借拙文之后为“陶山普通话”本义的误解，加以澄清，以消除误会。